

我的父亲

# 邓小平

戎马生涯

邓榕著



# 我的父亲邓小平：戎马 生涯

邓榕

中央文献出版社

# 目 录

引言 .....	4
第一章 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 .....	5
第二章 在广西的政治舞台上 .....	8
第三章 到广西去 .....	12
第四章 举行百色、龙州起义 .....	17
第五章 国事家事伤心事 .....	21
第六章 红八军的兴衰 .....	25
第七章 红七军的勃兴与右江红色革命根据地 .....	27
第八章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由来 .....	32
第九章 红七军的遭遇 .....	36
第十章 红七军光辉永存 .....	42
第十一章 三十年代初期的变迁 .....	47
第十二章 瑞金与中央苏区 .....	52
第十三章 第一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	56
第十四章 邓、毛、谢、古事件 .....	60
第十五章 红星报的主编 .....	66
第十六章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	71
第十七章 长征序曲与遵义会议 .....	76
第十八章 红军不怕远征难 .....	81
第十九章 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 .....	87
第二十章 西安事变前后 .....	93
第二十一章 走上抗日战场 .....	98
第二十二章 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	104
第二十三章 我的外公浦在廷 .....	112
第二十四章 浦琼英到卓琳的道路 .....	118
第二十五章 在太行山上 .....	125
第二十六章 艰苦岁月 .....	131
第二十七章 走向恢复和发展 .....	138
第二十八章 神圣抗战的胜利 .....	144
第二十九章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	150
第三十章 内战前夜 .....	157
第三十一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 .....	161
第三十二章 突破黄河防线 .....	167
第三十三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 .....	172
第三十四章 逐鹿中原 .....	178
第三十五章 决战之前 .....	185

第三十六章 大决战.....	190
第三十七章 打过长江去.....	199
第三十八章 向大西南进军.....	206
第三十九章 西南局第一书记.....	211
第四十章 没有结束的故事.....	215
本书最后的话.....	218
鸣谢 .....	219

# 引言

在我党的指示下，杨登瀛很快和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头面人物陈立夫、张道藩拉上了关系，并变为他们的亲信。他还得到了上海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特别赏识和倚重，同时，他与外国巡捕房，特别是英国巡捕房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杨登瀛那里提供的大量情报，对于防止我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被捕人员和清除叛徒内奸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我特科又利用杨登瀛的关系和介绍，把共产党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党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顺利而卓有成效地开展着工作。1928年，由李强负责，在上海中央建立了我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电台。同年，在香港的南方局，又由李强建立了第二个秘密电台，并于1930年开始沪港通讯。

# 第一章 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片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中央于1927年9、10月间从武汉迁至上海。

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随中央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上海虽为鱼龙混杂之地，有利于我党开展地下工作，但其地仍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所严密控制。敌人利用各种手段，企图破坏我党地下组织和捕杀我们党的领导人。他们利用外国巡捕镇压，利用特务监视，利用叛徒告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三年内，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委部长杨殷等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1928年11月，中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务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加强对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同志的保卫。

早在1928年春天，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陈赓等负责，我党的特科就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的关系，杨登瀛。

杨登瀛，又名鲍君甫，曾留学日本。杨社会关系复杂，与各党各派、外国租界人士以及黑社会都有来往。有人称他为四朝元老，就是因为他与国民党、日本人、汉奸、共产党都有联系。1928年，蒋介石着手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他们选定由杨登瀛来建立侦探机关。杨登瀛同情革命，因此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党。我党便由特科负责人陈赓亲自负责，把杨登瀛发展为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在我党的指示下，杨登瀛很快和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头面人物陈立夫、张道藩拉上了关系，并变为他们的亲信。他还得到了上海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特别赏识和倚重，同时，他与外国巡捕房，特别是英国巡捕房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杨登瀛那里提供的大量情报，对于防止我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被捕人员和清除叛徒内奸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我特科又利用杨登瀛的关系和介绍，把共产党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党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顺利而卓有成效地开展着工作。1928年，由李强负责，在上海中央建立了我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电台。同年，在香港的南方局，又由李强建立了第二个秘密电台，并于1930年开始沪港通讯。

李强叔叔告诉我：“后来我们又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建立了第三个电台。建这个电台还有个故事。那时广西军阀俞作柏在香港买了一个电台设备，放在他弟弟俞作豫手里。俞作豫不敢用，就给了我。这台机器是买的英国马科尼公司的，我不敢直接去拿，就通过在香港熟悉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帮我取来，然后找人带到上海，再由上海带到苏区。我、伍云甫、曾三，和一个做机器的工人，四个人到了苏区，1931年才建立了苏区的电台。当时我们在苏区的电台是用的手摇发动机，很艰苦的。”

1931年以后，上海中央的工作环境，由于敌人的破坏，变得更加危险和恶化了。这时，发生了两起恶性事件，给党中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的叛变。

顾顺章原是上海的工人，但此人原来参加过青红帮，三教九流的关系都很多。据一些老同志介绍，他人很精明能干，路子也很多，他在组织上海工人运动中是有能力的，在负责特科的工作，特别是除奸工作中是得力的。但是他的个人品质不好，有流氓无产者的习气，生

活腐化，还抽大烟，为此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批评。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私自在武汉的游艺场公开耍把戏（他会耍魔术），结果被一个叛徒认出而被捕。当天，顾顺章就叛变了。

顾顺章是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的机密极多，还知道许多中央机关和负责干部的住址。因此他的叛变，将会给我党带来灭顶之灾。

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抓到这样重要的中共要员，当天即发电报给南京特务本部。这份电报，当即为我党党员、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截获。钱壮飞一见情况紧急，立即亲自赶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

针对这一极其危险和严峻的局面，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亲自布置，采取措施，把顾顺章知道的机关和人员立即转移，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周恩来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去通知一些负责同志转移。朱月倩回忆说，那天晚上，她听见敲门，一看是周恩来，原来周恩来是来通知她转移，并和她商量如何保障她的丈夫、军委负责人霍步青的安全。霍步青此时刚从上海出发坐船到武汉。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紧急安排，霍才中途下船，避免了在武汉遇险。

当敌人于4月28日开始根据顾顺章提供的情报大肆搜捕时，党中央的机关和人员早已安全转移，度过了这一险关。

但是，顾顺章的叛变，毕竟使我党中央多年经营起来的地下工作系统和局面受到了无可估价的损失。一些机关撤离了，一些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转移离开上海。顾顺章还出卖了为敌人逮捕但没有暴露身份的中央领导恽代英，使其惨遭杀害。顾顺章同时也出卖了杨登瀛，后杨登瀛因与张道藩的特殊关系，才得以脱险。

顾顺章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恶运的惩罚。1935年，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因闹派别、拉山头而被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处决。

此乃千古罪人，死有余辜！

第二起事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向忠发原来是一个工人，其人并没有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扶植才当上中共党的总书记。在他任总书记期间，党中央的实际日常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和其他同志处理。

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又不遵守纪律，他还从妓院里讨了个小老婆。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妈妈说：“恩来同志发现了这些情况，就派我的妈妈去和向忠发的那个小老婆住在一起，注意他们。恩来当时想把向忠发弄到苏区去，于是先把向忠发的小老婆转移到一个旅馆住下，把向忠发转移到周自己的住处，告诫他不要外出。但是向忠发违反纪律，乘恩来同志不在，便偷偷去看他的小老婆，而且住下就不肯走了。我妈妈还去敲门警告他们，他们也没理。第二天他叫出租汽车，被司机认出，报告了警察局，向忠发就被捕了。”

这是1931年6月22日的事情。24日，向忠发就叛变了。

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也就是黄木兰告诉我：“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在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十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手指头，六十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十一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住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午夜一点，我们布置在恩来住宅周围的装作馄饨担子的特科工作人员，看见巡捕带着向忠发来了。向忠发有恩来的房子钥匙，他们看见向忠发带着手铐，去开恩来的门，结果里面已经没有人了。真险哪！”

向忠发身为中共党的总书记，他的叛变，本来会给我党造成更大的破坏，但是，好像是老天有眼，该叫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绝！

向忠发一被捕，上海的特务机关立即给南京的总部发报，说抓到匪首。当时蒋介石在庐

山，他一看到电报，当下批示立即就地枪决。向忠发一叛变，上海又马上发电给南京报告，可是不久就收到立即枪决的指示，于是奉命枪毙了向忠发。等蒋介石收到向忠发叛变的电报，着急也没用了，因为人已枪下作鬼了！

这些恶性事件的连续发生，使得党中央在上海的活动越来越困难，一些中央负责人纷纷转到苏区，周恩来也于 1931 年 12 月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的中央苏区。

父亲曾回忆说：我们在上海作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在上海党的秘密工作中，最最可恶的就是那些叛徒，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还出卖了其他共产党人的生命。

父亲提到的何家兴就是一个，他们夫妇从苏联归来，不满足于清贫的生活，遂背叛了革命，在 1928 年 4 月 15 日出卖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

1929 年 8 月，原为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了正在召开军委会议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五同志。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惨遭杀害。

同月，内奸戴冰石告密，国民党沪淞警备司令部当场逮捕了我一秘密机关的七位同志。

还有，黄埔一期学生叛徒黄第洪出卖过周恩来和他的会面地点，一些叛徒还出卖过李维汉、李立三等党中央负责人。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最后都没能逃脱正义的法网，受到了应得的严惩。

白区的地下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只有在艰苦危险之中，方能暴露那些败类，也只有在艰苦危险之中，方能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 第二章 在广西的政治舞台上

1929年7、8月间，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去广西工作，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组织武装起义。

这次中共中央派人去广西，是应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的要求而派遣的。

为什么在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俞作柏却要邀请共产党前去广西呢，话还要从头说起。

1927年，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相继背叛了革命后，大革命运动宣告失败，而国民革命的目标——北洋军阀政权却并未消亡，加之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使得蒋介石实现独裁统治的美梦难以实现。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北京的军阀政权、汉口的汪精卫政权和南京的蒋介石政权三足鼎峙的政治局面。

中国，仍然是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而且，新的割据必然酝酿着新的战争。

1927年10月，首先爆发了宁汉战争。蒋介石联合两广和北方冯玉祥，出兵讨伐武汉唐生智。11月，唐生智寡不敌众，下野出逃。宁汉战争虽使“三湘悉平”，但桂系势力却借机得以膨胀，蒋桂矛盾由此加剧。

1929年9月，蒋介石暂时强忍与汪精卫的对立，联合原来支持汪精卫的广东张发奎，在广东发起兵变，强行迫使控制了广东的桂系军队退回广西。蒋介石利用汪、桂矛盾，一面打击了桂系，一面又驱逐了汪精卫，一举两得，坐收渔翁之利，转眼间便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

但是，解决了宁汉、蒋桂之争，并不等于已经独得天下。当时的局势是，冯玉祥占据着豫、陕、甘、宁地区；阎锡山占据着晋、冀、绥、察和平津地区；桂系势力占据着桂、湘、鄂地区；而蒋只占有沪、宁、杭和江浙地区。

蒋、冯、阎、桂，各路盘踞，互存戒心。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实现独裁统治的目的，削弱冯、阎、桂各派实力，以“整理军事”和“实施训政”为名，要将全国各路人马和各派势力的军额、饷额进行“编遣”，以图加强对各个派系的控制。

这一编遣计划，非但未能付诸实施，结果反而更加加剧了蒋介石与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为了向蒋介石示威，冯玉祥在西北加紧备战，阎锡山在山西进行作战演习，李宗仁在武汉实行兵工政策，白崇禧在河北大搞军事会操。一时之间，真是大有战乱将起，举国惊恐之势。

旧军阀去了，新军阀又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仍是由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势力充当主角。

旧军阀的仗打完了，新军阀的仗又开场了。这成年累月，无休无止的军阀混乱，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更加苦难的兵祸战乱的苦难深渊。

这乱、这灾、这苦、这怨，真不知何时可休，何日可了！

新的军阀混战终于来了。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

同年11月，蒋冯之战爆发。

同月，第二次蒋桂战争爆发。

1930年3月，阎锡山联合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及桂系李宗仁、张发奎，通电反蒋，“中原大战”爆发。

此战历时七个月，百万大军厮杀于中华腹地千里战线之上，双方死伤三十余万。这场大战规模空前，耗资巨大，出场人物也最多，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

通过这些战争，蒋介石一再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各派系内部的矛盾，一用重兵弹压，二用重金收买，三用高官拉拢，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终于逐次击败了阎、冯、桂等实力派系的几十万军队，实现了独裁统治和形式上的统一。

以上讲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军阀混战，下面单讲蒋桂之争。

在这些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与桂系势力的争斗最先爆发。在蒋介石实现独裁统治的道路上，桂系势力的威胁一直如鲠在喉，必欲先吐为快。

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宁汉对立局面中，蒋介石曾联合桂系攻打武汉。后来，桂系又与蒋介石一起北上共讨盘踞京、津的奉系旧军阀张作霖。在这两度攻伐之中，桂系军队能征善战，锐勇无敌。

桂系利用战争之便，迅速扩张势力，占领地盘。白崇禧进驻华北，黄绍占据广西，李宗仁则进驻武汉。桂系以李济深坐镇广西，李宗仁统辖两湖，白崇禧进驻唐山、山海关。一时之间，桂系势力，从广东至长江，再到华北，大有虎视眈眈，欲与蒋氏一争雄雌的架势。

桂系也是“得势便猖狂”，占了地盘还不算，又免去了蒋介石信任的湖南省主席的职务，以何键取而代之。此事恰如一条导火线，使本来就已岌岌可危的蒋桂联盟终于破裂。

1929年3月，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准备以南北两路夹击武汉。而桂系方面亦严阵以待，加紧在武汉一线的布防，准备与蒋一行决战。

正在这双方都已剑拔弩张，大战行将爆发之际，桂军大将李明瑞突然率领所部第四旅由武汉南撤至湖北孝感，然后又宣布服从蒋介石的“中央”。李明瑞的这一行动，顿使桂系大惊失色。眼见大势已去，桂军遂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撤退。

4月4日，蒋军进入武汉，并下令继续对桂系实行武力追剿。同时，蒋介石继续以金钱、官位相许，使更多的桂系军人倒桂投蒋。

蒋介石一方面对付武汉的桂系；一方面讨伐占据平津的桂系白崇禧，迫其弃军逃港；一方面调广东的李济深北上软禁，拆散了粤桂联盟；一方面下令由湘、粤、滇三路进攻桂系大本营——广西。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虽积极组织力量反攻，但终因寡不敌众，于激战之后败退广西。6月，粤军相继攻占桂林、梧州和广西首府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丢兵弃将，相偕逃往香港。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蒋桂之战以蒋胜桂败而告结束。

在这场蒋桂战争中，使得桂军败北的中心人物，就是桂系中的俞作柏和李明瑞。那么这俞李二人究竟是何等之人呢？

俞作柏，广西北流县人氏，与李宗仁共为陆小同学。年轻时参加广东讨袁护国军，曾任参谋、连长。在两次粤桂战争后，粤军占据广西，李宗仁接受粤系的收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俞作柏在李宗仁麾下担任第一统领，下辖两个营。

俞作柏一边随李宗仁受编于粤军，一边在广西暗中发展自己的实力。

后来粤军陈炯明阴谋背叛孙中山，为了集中兵力，把粤军从广西撤回。这样，李宗仁便趁势宣布脱离与粤系的关系，自我改编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并自封为司令。

就在李宗仁在广西发展新桂系的同时，原粤军统领黄绍和白崇禧，联合俞作柏，一致决定脱离李宗仁，相约追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1925年6月，孙中山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俞作柏担任第一团团长。在孙中山国民革命军统一广西的战争中，俞作柏能征善战，继而又升任第三路军司令。

俞作柏这次行动，使他与李宗仁之间的关系从此伏下嫌隙。

李明瑞，广西北流人，俞作柏的姑表兄弟，自幼靠其舅舅（俞作柏的父亲）接济上学，

后靠俞作柏介绍进入广东韶州滇军讲武堂第一期甲班学习，毕业后一直投效俞作柏麾下，历任排长、营长、团长职。李明瑞年轻胆大，骁勇善战，一直为桂军中的一名身先士卒的战将。他和其表兄俞作柏一道，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

1926年两广统一，此时，正值国共合作的高潮到来。中国共产党派黄日葵、谭寿林、陈勉恕等共产党员来到南宁，组成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筹备小组，开展党的工作。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广西也呈现出一派革命的生机，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等进步组织纷纷成立。俞作柏、李明瑞对于这一派革命形势深感兴奋，衷心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桂军中的国民党左派人物。

这时，国民革命第七军进行了整编，军长为李宗仁，党代表为黄绍，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黄日葵。李明瑞为第二旅旅长，下辖三个团。而原来拥有兵权的旅长俞作柏却改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西分校校长，实被削去兵权。这，当然是由于李宗仁对俞作柏心怀不满而暗作手脚所致。

1926年7月，北伐誓师大会后，全国掀起了国民革命的浪潮。北伐军一路北进，所向披靡。

李明瑞在统一两广时曾屡建战功，在北伐战争中，更是功勋卓著。作为第七军的主攻部队，他与友军攻下长沙，攻下咸宁，攻下武汉最后一道防线险关贺胜桥，进而挺进江西。不到三个月即三战三捷，最后在南京附近龙潭战役中，全歼渡江北来的孙传芳部队。李明瑞勇不可挡，屡建奇功，是北伐军中赫赫有名的一员能征善战的战将。

本来，对于像这样一位有功之臣，应该是奖赏有加，但却不想，李宗仁、黄绍却竟然嫉贤如仇。为了削弱李明瑞的实力，他们下令撤掉了李明瑞左右的得力助手的职务，还为了一己私利，重用他人，而且拖欠军费，使得官兵困苦异常。而一些李宗仁、黄绍所用之鄂籍军官，却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因此，李宗仁、黄绍与李明瑞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桂系内部这一矛盾，早已为蒋介石所获悉，这时，他正为桂系势力迅速膨胀而焦虑万分呢。蒋介石将计就计，要倒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必用俞作柏和李明瑞。

蒋介石秘密派人，分别向李明瑞及在香港的俞作柏表示拉拢之意。一时之间，传闻四起，连桂系部队内部都已谣言不断，人心疑惑。

俞作柏被李宗仁等削去兵权，排挤出广西，一个人在香港权当寓公。蒋介石以重诺许他：一是委任他为海陆空军总司令上将参议兼广西省主席，二是给军饷二百万元，三是俞作柏和李明瑞共掌广西，桂军由俞李二人编遣。

蒋介石的为人，阴险多疑，诡计多端，众所周知。他的坐榻之旁，岂能容他人安睡？俞作柏和李明瑞早已知道，蒋介石分明是想利用他们除掉李宗仁等桂系实力派，并非真的对俞氏兄弟特别青睐。但是，利用蒋介石除掉李宗仁和黄绍，对他们来说，仍不失为一个良机。

蒋桂大战爆发以后，蒋介石部队大举向桂系实行全线进攻。桂系李宗仁也气势汹汹，誓与老蒋决一胜负。

正在此时，李明瑞看看时机已到，便突然宣布独立，不参加蒋桂大战，这一举动，好似抽掉了桂军的一根主筋。很快，桂军便兵败如山倒，显赫一时的桂军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外逃香港，鄂军胡宗铎、陶钧等被迫下野。蒋介石万分惊喜地通电全国：“兵不血刃而定武汉。”

倒桂成功之后，李明瑞立即挥师南下，经广东而回广西，未遇抵抗地占领了梧州，继而占领桂平，最后占领南宁，一举平定广西局势。

目的已经达到，俞作柏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总指挥陈济棠）、广西军事编遣特派员和广西省绥靖司令。

俞、李执掌广西军政大权后，军政基础极为薄弱，军费方面筹措艰难，省内经济困难重

重。蒋介石原许二百万金，其实根本没有兑现。原黄绍所留部队虽然接受编遣，但其实并不甘受俞李节制，实力仍存。

蒋介石利用俞李打败了桂系，谁知何日何时又会用何人来打败俞李？

蒋介石绝不可信，旧桂系乃是死敌，于是，俞作柏、李明瑞便通过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找共产党，希望共产党派人，帮助他们撑持局面。

其实，俞作柏和李明瑞并非与共产党素昧平生，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期，即有黄日葵、姜祖武等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桂系部队，并担任一定要职。俞作柏受到大革命进步思潮和进步人士的影响，支持工农学生运动，1926年就任过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和农工厅长，还举办过农民讲习所。“四·一二”事变后，黄绍以共产党嫌疑开除了俞作柏的国民党党籍，迫使俞作柏避走香港。事偏有巧，俞作柏在香港期间，又与我党在港的共产党人士多有接触，并参加了我党在香港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俞作柏还通过其弟俞作豫向我党提供过一部电台。

俞作柏对于共产党，心中本无芥蒂，而且向有好感。而李明瑞则本来就生性磊落，倾向革命。“四·一二”事件后，他对于蒋桂军阀以“清党”名义迫害共产党人十分气愤，忍痛送走了所部共产党员。

更为凑巧的是，在俞作柏和李明瑞身边，还有一个秘密共产党员，每日耳濡目染，对他们进行提示。那就是俞作柏的同胞兄弟俞作豫。

俞作豫曾在广州护法军燕塘讲武堂就读，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任李明瑞旅下辖第三团团团长，也是一员勇猛战将，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江西德安等战役中建有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俞作豫于1927年10月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队。1929年春奉命到桂军俞作柏、李明瑞部进行秘密工作。当其兄俞作柏、表兄李明瑞一经表示想邀请共产党共事商议之时，俞作豫义不容辞，立即与我党取得了联系。

由此，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央代表即为邓小平。

## 第三章 到广西去

1929年7月到8月间，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际，父亲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赶赴广西。

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是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邓希贤了。在国内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艰难困苦和白色恐怖之中的革命活动，使他增加了不少的革命斗争经历。自从在“八七”会议之前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以来，特别是在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后，他有机会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有机会参加党的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技术性工作，这对于他增加工作经验，提高政治政策水平，了解全国革命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不啻是大有裨益。

此时的邓小平，已具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更高的政治水平。

父亲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党的南方局取得联系。

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设立在香港，负责广西、广东两省的工作。因为香港和上海一样，是租借地，因此便于我党的工作掩护。

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贺昌和夫人黄木兰（定慧）、聂荣臻与夫人张瑞华两对夫妇住在香港跑马地的凤凰台附近。父亲一到香港，便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据黄定慧回忆：“那时我们夫妇和荣臻、瑞华住在一起，小平同志到香港后住在一个旅馆，他到我们住的那里来过一次，主要是与贺昌同志和聂荣臻同志一起谈广西的工作。他还在那里吃了晚饭，菜是我和瑞华烧的。后来贺昌曾去了广西，参加了广西省委的会议，还和你爸爸两个人都讲了话。贺昌在广西几天就回来了。”

为了保持和中央的联络，党中央还派了特科的龚饮冰与邓小平一道前往广西，并带着电报密码，负责机要工作。

与此同时，我党还陆续派了几十名军政干部，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进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他们或是由人介绍，或是改换姓名，都未公开使用共产党员的身份。他们之中有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楚）、徐开先、李谦、冯达飞、叶季壮、李干辉、余惠、李朴、沈静斋、许卓、许进、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袁振武（也烈）、史遽然等。

张云逸是粤军海军司令陈策写信介绍来的。袁任远是李明瑞的秘书、共产党员姜祖武介绍来的，而袁任远又介绍了余惠这一湖南同乡。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一个又一个的共产党人，按照党给他们的指示，来到了广西。

大约在9月间，父亲和龚饮冰到达南宁。

到达南宁后，父亲首先和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了联系。9月10日，中央代表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等三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父亲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会议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还通过了有关农村工作、宣传鼓动工作、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等问题的文件，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策略，并选举了以雷经天为书记的广西特委。

父亲回忆：“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

父亲到广西后化名邓斌，公开以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作为掩护，实际则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

在广西，父亲迅速和俞作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首先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这些政治犯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工会农会会员和进步青年，都是在“四·一二”以后被桂系逮捕关押的。早在5月份，李明瑞倒戈反桂的进军途中，在梧州就曾释放过被关押的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现在，广西军政大权均已掌握，俞作柏和李明瑞便作出决定，释放全部在押“政治犯”。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轰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中共南宁区负责人罗少彦、工人运动领导人何健南、共产党员谢鹤筹、吴西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特别是一批党团员干部，后来都成为建立广西红军的骨干。

李明瑞在掌握广西军事大权以后，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非常需要扩建军队，以充实力量。李明瑞由武汉带回的部队仅有三万余人，而旧桂系吕焕炎收编的桂系残部也有三万多人，这些桂系旧部名义上虽接受编遣，但实际上并不能为李明瑞所调用。因此，李明瑞急需建立一支自己能够掌握的部队。于是广西警备大队应运建立，下辖新编第四、第五两个大队。

在这种形势下，父亲等人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提出建议，建立教导总队，以培训初级军官。用这种方式，我们党把一百多名干部学员安排进教导总队，培训和教育了近千名李明瑞旧部队中的进步青年，并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

在与共产党的协商下，一批共产党人被安排到新建的警备大队中。四大队，共产党员张云逸为大队长，共产党员李谦任副大队长。五大队，共产党员俞作豫为大队长，共产党员史遽然为副大队长。按照中央代表邓小平的指示，张云逸等在四大队中安排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担任连排干部。他们还向士兵加强了革命思想教育，惩办了民愤极大的旧军官，吸收了大量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部队，使部队的成份和思想面貌都得到了改造。由于群众的踊跃参加，第四大队由一千人很快扩大到二千人。在第五大队，俞作豫也调来了一些农民运动分子充实军队，人数也迅速上升为二千人。而教导总队，也由共产党员徐光英担任负责人。这次扩充的新军，便成为以后建立红七、红八军的基本武装基础。

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在广西开放了进步的群众运动，省农协得到了恢复，而且召开了代表大会。工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相继恢复，整个广西，在短短的时间内，好像又回到了大革命前那种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潮之中。

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着手在农村拔掉黄绍的旧势力，任命了一批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农民运动领袖担任各县县长，其中就有东兰县的韦拔群。俞作柏还根据共产党的推荐，委任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致使左右江二十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所执掌。

在共产党支持下，俞作柏、李明瑞支持农民武装，给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以“右江护商大队”的正式名义，并发拨几百支枪以示支持。

右江东兰的农民运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蜚声省内外，因为这里有一个卓越的广西农民运动领导人，韦拔群。

韦拔群出身富裕之家，早年即有爱国之志，曾参加讨袁护国，1925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当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发展之时，广西右江地区由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地农民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农民运动地区之一。韦拔群不但建立了农民协会，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他们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把农民运动搞得一派热火朝天。1926年春，桂系军阀慌忙派军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韦拔群乃是真正的革命英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率领农民军坚决打击敌人，占领了县城，迫使当时的桂系省政府承认了东兰农运的合法地位，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四·一二”事变以后，广西革命斗争转入地下，而在这一片白色恐

怖之中，独有东兰拔哥率领的这支农民队伍，始终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

韦拔群，拔哥，是广西广大农民群众的骄傲和英雄。他在右江地区创下的武装力量和建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今后红军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除了兵运工作以外，父亲和广西特委，针对原广西中共地方组织非常零乱的状况，抓紧恢复和发展各地方组织，使广西地方党的组织逐级建立了联系，同时还举办党员学习班，出版了党内刊物。

南宁变了！广西变了！

一个新的革命热潮在南宁，在广西，迅速发展了起来。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唯独广西，出现了革命新高潮。这种局势，真是令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耳目一新，为之振奋。而桂系首领李宗仁则惊呼：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已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父亲到了广西后，在他的主持下，广西党的活动已积极活跃起来了，和俞作柏、李明瑞的合作已顺利开展起来了。他和其他党中央派来的同志们的工作，已迅速初见成效。

但是，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父亲到了广西后，并未公开露面，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只和极少数的人进行接触和联系。除了党内很小的范围以外，父亲只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对俞加强工作。父亲在积极开展广西的工作的同时，和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及时请示和汇报工作。

广西局势的发展，早已引起了各色人物的注视。共产党虽未以公开名义活动，但活跃的革命气氛已足以引起反革命人士的密切关注。已经有人在高喊：“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致使左右两江赤焰滔天，原东兰之共匪，也就死灰复燃。”

这，尚且是局外人士的惊诧，那么曾经支持俞李倒桂的蒋介石，就更加关切广西局势的发展了。

蒋介石这个人，素来以城府很深，工于心计而著称。早在联合俞作柏、李明瑞倒桂之时，他就已着手安排，派员进入李明瑞的十五师当政治部主任，以进行监视。这员大将，就是鼎鼎大名的国民党高级特工，黄埔四期学生郑介民。广西发生的这所有的一切，当然由郑介民这一耳目一五一十地全部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而蒋介石，对于广西所发生的情况，亦当然不会满意，但如何才能挟制住俞、李所为，一时尚未有妙策。

说来也凑巧，势态的发展，很快便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个除掉俞、李的良机。

1929年8月间，一直与蒋介石龃龉相争的汪精卫，以中国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统”名义，企图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一些对蒋介石的作法心有不满的军事集团，共同反蒋倒蒋。汪精卫一边策动张发奎的第四军由鄂西经湘、桂进攻广东，欲夺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一边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作柏、李明瑞共同反蒋。

当时俞作柏和李明瑞感到，反蒋虽是他们的既定目标，但他们刚刚打败旧桂系，军政权力均未巩固，而且军费军饷都十分缺乏，因此对于此时反蒋，尚觉迟疑。

汪精卫看到俞、李的犹豫，于是一再电催，同时还让薛岳带了不少的港币，以作诱饵，敦促俞、李迅速发动反蒋，以配合张发奎东下的军事行动。汪精卫还委任俞作柏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讨蒋总司令”之职。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惊。

蒋介石一面让郑介民赶紧对俞、李加紧劝说，一面于9月亲自给李明瑞来电。电中大骂：汪精卫的改组派，“买空卖空，专以牺牲他人为惯技”，“早为总理之叛徒，为党之败类，陈炯明之余孽，共党之走狗”。电中劝说李明瑞亲赴南京，“以息谣诼”。蒋介石还威胁，如李明瑞不从，则“吾为党国计，不得不以公忘私，以尽吾革命之天职”。

在汪精卫的一再催促和蒋介石的威逼恐吓之下，俞作柏、李明瑞认为，联合张发奎的第

四军夺取广州，对广西也是有利的，于是便义无反顾，选择了坚决反蒋的道路。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举行了反蒋誓师大会，发出通电，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随后，俞、李立即对其所辖各部队作了战斗部署，李明瑞还亲赴前线，指挥军队向广东进攻。

俞、李通电反蒋后，南京《中央日报》惊呼：俞、李勾结共产党反蒋。蒋介石分析了广西的形势，决定以收买方式瓦解俞、李部队。

蒋介石的确不愧为一代枭雄。他之所以能纵横捭阖，最终实现独裁的目的，全凭了他善于分析形势，善于利用矛盾，善于使用各种手段以对付各种敌手。

李明瑞手中部队，只有十五师和五十七师为亲信，其余吕焕炎、梁朝玠、蒙志仁等部均为桂系旧部，本来就难于控制。蒋介石先下手为强，以约二百万元的重金和第七路军总指挥之职收买了吕焕炎。并以三十万块大洋和师长之职，收买了李明瑞最亲信的旅长黄权。

李明瑞刚刚到达前线桂平的黄权旅部，正准备亲自督战，不料突闻吕焕炎等桂系旧部，以及杨腾辉和黄权已为蒋介石收买，倒戈通电拥蒋。这一下子，三个主力师和一个旅均已倒戈，李明瑞手中的军事实力瞬间丧失殆尽。

这次反蒋，不到十天就告失败，眼见大势已去，李明瑞只得带着少数随从，仓促返回南宁。

在俞作柏、李明瑞决定参加通电反蒋时，我党即客观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李明瑞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且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因此此次反蒋定会失败。

俞、李不听我党劝告通电反蒋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防不测，父亲决定把我党已经控制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担任保护后方的任务。经父亲等人一再说服和坚持，俞、李终于同意了这一方案。

俞、李率大队出发后，父亲与张云逸等立即着手准备应变。他们派四、五大队各一个营去左、右江地区，先行准备工作。在南宁，利用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控制了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集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备好停在江边待用，作好一切应变准备。

幸亏有父亲等共产党人的远识和未雨绸缪，否则，俞作柏、李明瑞这次倒蒋将会遭到全军覆没，不但不会东山再起，就连一块容身之地，恐怕亦难找到了。

俞作柏、李明瑞仓皇逃回南宁后，立即准备再向左江逃去。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商议后，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百色、龙州作为重点，重新开创局面。

这一决定经秘密电台上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并得到了批准。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

10月中旬的一天，入夜时分，南宁市区内枪声四起。兵变部队突然行动，打开了军械库，搬取了所有的枪械和弹药。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宣布行动后迅速撤离南宁。

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一小部分，由张云逸率领沿右江逆流撤向西北方向的百色地区。第五大队，由李明瑞、俞作豫率领沿左江撤向西南方向的龙州地区。

而父亲，则率领着党委和地方做秘密工作的同志，指挥着装满军械的船队和警卫部队，沿水路溯右江，向百色地区进发。

参与当年兵变的许凤翔回忆：“十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晨雾迷茫，在南宁海关的码头上，同志们紧张而有秩序地把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搬上大小船只，然后上船出发。我乘坐的是一艘汽船，最后上船的一位同志，身材不高，体态结实，二十多岁年纪，精力充沛。他一边登船，一边微笑着和先上船的同志们问好。我不认识这位同志，忙向别人打听，正在这时，有人开玩笑地说：‘秘书来了，咱们把铺位让出来吧！’原来，他就是我们行动的最高领导人邓

小平同志，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当时在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的袁任远回忆：“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从水路向右江进发。很巧，我和余惠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没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

父亲率领着他们的船队，在滔滔江水中逆流而上。江水在船舷边翻起浪花，南方十月的风吹拂着每一位革命战士的脸庞，他们的心，犹如阳光般的明亮，他们的激情，犹如这江水翻滚激荡。

船队一路顺风，不久即到达右江地区。

对于中央代表邓小平，张云逸早已久闻其大名，只是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而从未谋面。部队到了田东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

张云逸在回忆中写道：“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了一会，忽然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二十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哦！你就是邓小平！’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就这样，在作为中央代表的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广西的党组织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把部队转移到百色和龙州地区，为在不久的将来，打起红旗，成立红军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基本条件。